

国际政治科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1/4

- 朱中博 中国古代强盛时期的大战略
- 杨 霄 中国产品公共卫生管理与美国舆情
- 曹金绪 同盟政治理论的发展
- 李隽旸 风习与政制
- 时殷弘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科学. 2011. 4/阎学通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97 - 3187 - 1

I. ①国… II. ①阎… III. ①国际政治 - 丛刊 IV. ①D5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2479 号

国际政治科学 (2011/4)

主 编 / 阎学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师旭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0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148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187 - 1

定 价 / 2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朱中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chestnut7766@yahoo.com.cn

杨 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电子信箱: chyoung@pku.edu.cn

曹金绪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博士研究候选人。

电子信箱: jinxucao@163.com

李隽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bohemienn@163.com junyang_lee@hotmail.com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电子信箱: y.shi@263.net

邹 磊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

电子信箱: zldiplomacy@gmail.com

中国古代强盛时期的大战略

朱中博◎

【内容提要】 大战略为总体战略或国家战略，包含国家的对外战略、内部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内外战略的结合，涉及国内、国外两个层面，而最终指向国家的对外目标。从类型上，可以将之划分为消极性、积极性与极端性战略三种。历史分析与数据统计表明，秦、西汉、东汉、西晋以及隋、唐、北宋、明等八个统一王朝在强盛时期的大战略行为较多呈现消极性色彩，但积极性与极端性战略特征也不容小觑。因此，外部政治力量与中国本身都应该审慎与理性地看待及应对未来中国的崛起，中国尤其要吸取历史上的战略经验教训，进一步休养生息，在追求自身国际权益的过程中，避免过火乃至极端的行为。

【关键词】 汉族统一王朝 强大时期 大战略行为 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未来中国崛起及其彻底走向世界性大国，将会采取怎样的大战略，其对周边及世界的影响将是怎样的？或者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张清敏教授、叶自成教授、王逸舟教授和钱雪梅副教授的悉心指导；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马骏博士、钱皓教授和汪宁教授亦对本文的完善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在此，笔者谨向他们深致谢忱。不过，一切文责由笔者本人自负。

《国际政治科学》2011/4（总第28期），第1—34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说,中国未来可能采取何种大战略政策?这些都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政治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大战略的“历史传统”(包括传统中国的战略观念与行为经验,尤其是对外行为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进而预判中国未来的战略行为走向及国际影响,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心和热论的一项重要议题。^①

从战略文化角度出发,对中国战略传统进行分析,近年来在学界日益流行。发轫者显然是哈佛大学的江忆恩教授。他基于对中国古代典籍(包括《武经七书》等军事类文献、孔孟哲学类文献、《明臣奏议》等)和明代战略文化与行为的实证分析,得出中国战略文化以“居安思危”(para bellum)或极端现实主义(hard realpolitik)为特征的结论。亦有学者依据不同的决策文献(如孔孟类文献与明朝诸帝实录),或基于两个朝代案例(明代之外,亦考察宋代),对中国的战略思想传统进行考察。^②但是,行为与观念不能混为一谈,即战略行为通常不应该被纳入战略文化概念之中,因此,对文化的分析并不能完全替代对行为的分析。同时,对单个或两个王朝案例的战略行为分析,也不能必然推知中国古代战略行为的整体特征。^③

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切入,分析中国的战略传统,更是多年来战略学界的一种主导性研究模式。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得出结论说,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往往采取和平或低暴力的防御战略,知兵但不好战。或者说,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大多采取了“和”的立场;即使不得不诉诸武力,也

① 在2011年3月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举办的“东亚历史经验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讨会上,多位学者指出,对东亚/中国对外行为历史(包括朝贡体制下与周边国家的互动经验、关键决策时期的战略争论与最终行为等)的考察,在当下特别富于理论与政策启示意义,因而应该加强相关的研究努力。

② 参见李晓燕博士论文:《战略文化与主导文化的一致性研究》;Yuan-kang Wang(王元纲),*Harmony and War: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等。

③ 非战略文化视角中,关于明朝个案的研究,可参见阿瑟·阿尔德隆:《14至17世纪的中国战略》,载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是以战促和，在实现“和”之后，仍然突出恩德感化的作用。^①亦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的安全战略目标是保持国内安定繁荣，并控制边缘地区或至少在那里保持至尊地位。为此，中国曾经频繁诉诸武力，并玩弄平衡、迂回等外交手腕，以及利用文化和经济制度优势。^②上述研究，相当程度上都洞见了中国传统战略行为的某些特征。但是，这类研究没有注意在地缘划定上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即未考虑当时王朝实际统治的地理范围，而以今天的国界定义当时的对外行为。此外，这类研究采用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缺乏对王朝案例的具体实证分析，或者说在涉及战略行为实证时往往着墨不多，因此，其结论的说服力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削弱。而且他们所使用的大战略概念，过于局限在军事或国家安全层次，^③这显然不利于判断中国崛起后的战略走向。因为未来中国的崛起，必然不会限于单一的军事领域或安全领域，而将是多向度、多层次的综合崛起。^④

本文试图基于广义的大战略概念，首先对大战略类型进行界定，之后从多个汉族统一王朝入手，分析它们在强盛（以及迈向强大）时期的大战略行为，总结并观察它们在总体上的大战略偏好一致性。^⑤最后，基于

① 参见李际均：《论战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1页；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9—532页；李少军：《中国的战略文化》，《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时刚、刘诚：《中国古代战略防御思想及其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等等。

② 迈克尔·斯温、阿什利·泰利斯：《中国大战略》（洪允息、蔡焰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内容提要”部分。

③ 关于大战略概念的应有之义，请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另外，时殷弘教授的新作——《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以雄劲的文笔呈现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两种战略传统：“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的战略传统、彻底歼灭和决战决胜的战略传统。然而，他所认为的与第一种传统契合的西汉前期的战略，其实在思想上更是黄老思想的直接产物，虽然也可以说与孙子兵法存在间接契合。至于将白起在战争（尤其在长平之战）中的大规模屠杀视为第二种传统的体现，则无疑更加窄化了大战略（甚至安全战略）的含义，在概念使用上也存在不严谨之嫌。时殷弘教授的观点，请参见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

④ 参见蔡拓：《中国大战略刍议》，《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第3页。

⑤ 本文中，“强大时期”也包括了国力迈向强大（即国力处于快速上升）的时期。

检验结果,分析其现实启示意义。到目前为止,选择对中国多个王朝强盛时期或迈向强大时期(而排除其实力衰退期)的战略行为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尚不多见。而笔者这么做乃是基于如下假设,即强大时期相较于其他时期,无疑更能凸显一个政治行为体的战略行为“本性”。^①因为当其处于强盛时期时,较少顾虑国际体系权力分配所施加的限制。对于中国古代王朝而言,基于在历史上东亚权力结构中的主宰性地位,当其实力强大时,显然更可以不受限制地展示战略“本性”。此外,将中国迈向强大的历史时期涵盖在内,是因为对于认识或判断当下同样处于国力上升期的中国战略行为走向而言,这似乎更具备针对性的启发意义。

具体来说,本文将选取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以及明代等中国历史上所有汉族统一王朝在强盛时期或迈向强大时期的战略行为,作为案例分析对象。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案例选取中个案异化的出现,并尽可能包含所有的战略行为对象。而排除元代与清代这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并非基于民族偏见,而是因为,为了检验及预测中国大战略行为的准确性,需要关注那些时期——其时,决策精英隔离于非汉族或西方战略特性的可能影响。从中国古代战略行为特性可能存在的程度来说,它更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汉族统治时期。

此外,在本文中,中国王朝大战略中的对外层次在地缘政治含义上,主要包括次外地缘与外地缘两类。所谓次外地缘,指过去很长时期内不在以汉族为中心的政权的管辖范围内,但又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后来与汉族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权;外地缘,指用今天眼光看,处于中国疆土之外,但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即自古迄今始终处于中国疆土之外的政治体或国家。需要指出的是,次外地缘(当然还包括内地缘),在今天都已经是中国和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②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的范围与对

① 此处得自徐进博士的启发性建议与指点。

②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外的地缘含义时有变化。因此，历史上中国的边境范围和对外的地缘含义并非一成不变。^① 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个历史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之中；反之，一些曾经属于中国的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②

二、大战略概念与大战略类型

大战略是个颇有歧义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难有定论。国内有学者总结了三种代表性理解：首先，大战略是战争谋略，这是最传统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大战略紧紧围绕着战争。但赢得战争要靠各种手段的综合利用和国家全部资源的有效调动。其次，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这种见解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手段实现的目标不仅是赢得战争胜利，还应当包括国家安全。再次，大战略是国家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这种见解是对大战略的最宽泛的理解。虽然其外延过于宽泛，但优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便于从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等多角度构建国家战略，而不必在研究时受更多限定，做更多解释，陷入概念的陷阱。^③

笔者认同第三种见解，即，将大战略等同于总体战略或国家战略，它要求通过武力以及武力之外的外交、政治、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实现包括国家安全（即应对外部威胁），扩大对外影响或追求权力等在内

① 关于中国古代国境范围的研究，可参见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境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2页。

③ 参见蔡拓：《中国大战略刍议》，第2—3页。事实上，赞同第二种看法的中国学者亦不在少数，如王缉思教授就认为，国际战略（即美国所说的大战略概念）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战略以及对外经济战略；其主要视角应该转向对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外部因素。这一定义虽然类似于上述第三种理解，但本质上更偏向于第二种战略，因为其强调“外部威胁”和“国际上的”，强调对外来威胁的反应。这样的大战略定义方式，或许更多是基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的政策议程导向。但这样就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设定为单向性的了，即中国似乎只能对外部的威胁冲击做出反应，而排除了中国可能对外部实施威胁或不实施威胁的可能。王缉思教授的相关定义，请参见王缉思：《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载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8年（总第一期）。

的国家根本目标。它是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其中包括若干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战略,通常围绕国家较长时间的宏大目标。它包含国家的对外战略、内部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内外战略的结合。^①也就是说,大战略涉及国内、国外两个层面,而最终指向国家的对外目标。

这一概念不仅涉及一国如何应对威胁,还涉及如何不威胁他国,从而涵盖一个国家战争与和平时期的综合战略行为。此外,它对判断未来中国崛起后的战略走向也更有意义。因为未来中国的崛起,正如笔者之前提及的,必然不会局限于单一的军事战略或安全战略领域,而必然是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等多向度、多层次的综合崛起。^②这与将军事手段及应对安全威胁视为大战略核心内涵的方式相比,拥有较多的优势。

明确了大战略的含义,还需要对大战略类型做出界定。兰德尔·施韦勒、^③ 勒特韦克、库普乾以及江忆恩等西方学者对大战略类型或国家追求的制衡方式做了划分,与此相关的研究还包括斯奈德及米尔斯海默更早期的著述,^④ 摩根索也曾将国家追求权力的斗争区分为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威望政策。^⑤ 但是,目前依然缺乏普遍接受的大战略分类法。上述学者的大战略分类法或局限于军事战略层次,或局限于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并未涉及决策者所用的大战略分类。

划分大战略类型需要满足两个标准:首先,战略类型之间的区别应当是分明的;其次,全部或多数合理的政治一军事行为应该被包括进来。^⑥

① 叶自成:《中国大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② 蔡拓:《中国大战略刍议》,第3页。

③ 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85—107。

④ 相关介绍可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10—114。

⑤ 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136页。

⑥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 112.

据此，并将政治—军事行为之外的大战略行为考虑在内，笔者提出了以下三种大战略类型：

1. 消极性战略^①

该战略主要依靠内部的稳定与发展来积蓄或维持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国家实力，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文化以及对外交往或影响^②的实力。在对外方面，不试图通过胁迫方式做出改变，而力求采取怀柔政策，以和解、非暴力或低暴力的方式解决对外争端与冲突。这在字面上类似于摩根索或施韦勒的维持现状的国家政策，但这样的国家未必是现有秩序的受益者。它通常是内向的，包括对现状的维持乃至在此基础上的退让，带有较大程度的消极性与和平、低暴力色彩，是一种弱势战略或被动战略。

2. 积极性战略

该战略一方面立足于内部的稳定与发展，维持或积蓄物质与非物质性的国家实力，另一方面则力求通过对外途径寻求实力，其中往往伴随对世界或地区秩序现状的较大改变，并较多诉诸强制手段。在字面意义上，这一战略类似于施韦勒的修正主义豺狗型国家的政策，是一种有限的修正主义，不会上升到帝国主义或无限扩张的层次。它带有较大的外向性与暴力色彩，但所指向的目标或落脚点在本质上是内向的。

3. 极端性战略

该战略主要依靠外向性手段或路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国内民众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即维持或积蓄、扩展物质与非物质性的国家实力，或满足统治集团的特定私欲。在对外的层面上，尤其表现在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扩张或征服。这类类似于摩根索的帝国主义政策，但在一定程度上

① 需要指出的，“消极性”与“积极性”、“极端性”一样，只是作为中性词语被加以使用的，不含任何贬义或褒义。

② 这里没有使用“外交”一词而使用“对外交往或影响”，主要是希望包容历史上更多政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尤其是基于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天下秩序及地缘政治。正如高明士所言，今天的国际关系，在传统中国应当称为天下秩序。但国际关系不同于天下秩序，传统中国没有现代的平等与独立概念的“外交”或“国际关系”，但是内外有别。参见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5页。

(尤其在对外目标的追求上)更类似于施韦勒定义的狼型修正国家政策。事实上,亦可以将之称为扩张主义战略。它带有极强的外向色彩和暴力色彩,是一种无限的修正主义。

以上三种大战略的区分,主要以积累国家实力的手段或路径,以及追求目标的不同为标准。其中,更侧重对所追求目标的关注,因为其于判断或预估国家未来大战略走向而言,更具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消极性战略类似于施韦勒的现状国家政策:现状国家既可能是狮子型,也可能是羊羔型的。不过,包括积极性战略与极端性战略在内,笔者都只是在反向格义的意义上将之与施韦勒或摩根索的划分法进行了对比,主要侧重它们在对外政策追求上的相似性。从本质上看,施韦勒的现状国家与修正国家或摩根索的现状政策与帝国主义政策的划分法并不与本文的三种战略一一对应。

三、王朝强盛时期的大战略行为

(一) 秦朝的大战略行为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王朝。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而言,其实力在当时都是无可匹敌的。当时的形势是:内部,几个世纪的战乱宣告结束,百姓渴望休养生息;外部,周边没有政治经济制度成形的国家,^①但北部的匈奴构成了威胁。匈奴逐水草迁徙,以射猎禽兽为生,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②掠夺性较强,且在战国末占领了河南地。但在实力上,与中国比显然处于劣势。这从统一前燕、赵、秦时时能够“袭破”匈奴的史实中可见一斑。即使统一后,东有强胡,西有月氏,匈奴也是处于左右受压的状态。可以说,匈奴对秦的威胁

①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191页。

② 《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

并不严重。至于南方百越，实力更无法与秦比肩。

秦的政策是，始皇为满足私欲，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① 其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② 可谓前所未有。在北方，他派蒙恬将兵攻胡，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③ 在南方，又派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结果，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④ 最终，在始皇离世之前，造成海内愁怨的社会危机，埋下了王朝覆亡的祸根。秦二世即位后，并未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终致王朝不可挽回的崩溃。

从以上看，秦朝强大时期的大战略行为符合极端性战略的内涵，带有很强的外向色彩和强暴力色彩——秦始皇怀贪鄙之心，欲立威海外，依靠外向性手段满足好大喜功的欲望，并使国内民众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然对内的徭役负担亦同样的沉重。持续的大规模对外用兵与“内兴功作”，耗尽了国内资源，造成了自身崩溃。

（二）西汉的大战略行为

公元前 202 年西汉立国，其强大前后的大战略态势及行为，颇值得关注。

1. 消极性战略时期

西汉初的形势是：内部，百姓死伤流离大半，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⑤ 社会元气亟待恢复。外部，匈奴趁中国混乱之际，实力复盛。尤其在冒顿时，东灭胡王，西击大月

① 《汉书·食货志第四上》。

② 《汉书·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③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④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

⑤ 《史记·平准书第八》。

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势力日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又不时侵扰雁、代等地,对西汉构成很大威胁。南方,则有趁秦亡而独立的南越赵佗政权。总之,国家实力不够强大,处于内外交困的时期。

在此情势下,高祖君臣对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致力于社会元气的恢复。汉相萧何顺流与民更始。曹参为相后,继续与民休息,并得到了惠帝、高后的认同,君臣俱欲休息无为。此后,休养生息的政策继续得到了文帝、景帝的贯彻。可以说,在立国初 70 余年里,汉代统治者对内自然无为,以闷闷之政,令民众安居乐业。

对外,高祖在白登之围后,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惠帝、高后时,冒顿致书于寡居的高后,其措辞挑衅侮辱。但高后仍能忍辱维持和亲。文、景时,仍然修和亲、通关市,如故约。^①同时,对匈奴的入侵,严加防御。对南越,高祖“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高后时虽与南越交兵,但高后去世后,文帝“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②并派陆贾出使,修复关系,使南越复为汉之藩篱。景帝时,南越称臣如故。

总之,西汉在实力不够强大时,依靠内部的稳定与发展积蓄国力,且对外不通过胁迫做出改变,而以和解、退让、低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实际意义上,汉朝并非地区秩序的受益者——从公元前 198 年至公元前 135 年,汉与匈奴和亲不下 10 次,但几乎都是汉朝受损,匈奴获益。对于汉朝,和亲已经变成无休止而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且不能阻止匈奴侵扰。^③可以说,西汉这一时期的政策是内向的,带有较大程度的消极性与低暴力色彩。

2. 从积极性战略至极端性战略

从高祖开始,数代皇帝奉行的消极性战略,日益使战略形势发生着变化。至武帝即位:内部,“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① 《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

② 《史记·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③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1 页。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①也就是说，经过 70 余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已臻于富厚。外部，早至景帝时，由于和亲以及西汉国力的增强，匈奴只能小规模盗边，而无大寇。至武帝时，双方力量的天平向汉倾斜。可以说，汉朝即将迈过崛起的门槛。不过，匈奴实力此时仍然相当强大，不时威胁西汉，并且早自老上单于起，匈奴已经开始征服西域，并很快控制了整个西域。

在此情势下，武帝的政策是：在文、景养马的基础上——武帝即位时，已有苑马四五十万匹——大规模组建、扩充骑兵，使之成为独立作战的主要兵种；^②经济上，通过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措施聚敛财富，为内外的政治、军事行动做准备。

对外，马邑之谋后，自公元前 128 年至公元前 119 年的十年中，汉朝通过河南、河西、漠北等三次决定性战役，尽歼匈奴主力，夺得了朔方至河西的大片土地。公元前 115 年武帝派张骞与乌孙、大月氏等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此汉与匈奴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此后，武帝还派兵征服了南越和卫氏朝鲜。此外，武帝还建珠崖七郡，开牂柯、越巂，通大宛、安息。^③

总之，武帝时的大战略行为宜分两阶段看待。前期，中国已经臻于崛起，它一方面立足于内部稳定与发展积蓄国力；另一方面则以强制性手段对地区秩序现状进行改变，即对匈奴的反击战役。它带有较大的外向性和一定的暴力色彩，但目标是消除匈奴威胁与袭扰，在一定程度上是内向的。但武帝中期后，即中国成功崛起后，对外的扩张开始出现。而且，外扩后，以百越、羌胡之地为园囿，“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④扩张似乎给王朝带来了很大利益。总之，武帝初，中国崛起后，奉行的是积极性战略，不久即表现出了极强的外向和暴力色彩，转入

① 《史记·平准书第八》。

②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6、317 页。

③ 《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④ 《盐铁论·西域第四十六》。

了扩张时代。

从武帝晚年开始,西汉大战略再次出现了转折。由于多次兴兵,西汉国力开始下降,王朝几乎处于秦始皇时代的危机中。此后,与民休息和武备为主的政策,再次回到了国家大战略主线中。然而,昭帝、宣帝时期,西汉中兴,国力再现回升趋势。这一时期,乃至元帝时,政府一方面减免赋役,招抚流亡,一方面不时继续对匈奴、西域的军事行动。公元前60年,汉朝利用匈奴内乱,设置西域都护,确立起了西域霸权,并接受了南匈奴的投降——这部分是由于匈奴内乱,南匈奴受到北匈奴威逼并打了败仗。南匈奴的投降标志着汉匈朝贡关系的建立,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①

那么,汉朝这一时期的对外行动是否基于扩张的目的?尽管不时有军事行动,但在对外的层面上,其主要的行为已经是“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②表现出了更多的低暴力或非暴力特征——以昭君出塞和朝贡关系为标志。可以说,汉朝的行为表现出了较大的收缩性。但收缩是谨慎的、有限度的,不乏采取强制性手段的时刻。但它的目标并非无限:“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③更多的是一种积极性战略。

(三) 东汉的大战略行为

自公元前43年,西汉与匈奴缔结盟约后,双方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局面。但王莽建新后,妄开边衅,发动了对匈奴及周边的战争,战祸持续数十年,再加上其复古改制及其他急躁的政治行为,最后导致政权土崩瓦解。正是在此天下大乱的情势下,刘秀建立了东汉。

1. 消极性战略时期

东汉初的战略态势是:内部,经过长期动乱与战争,天下户口减半,生产力严重破坏,社会元气大伤;外部,匈奴趁中国内乱,实力转盛,

①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第45—46页。

② 《汉书·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③ 同上书。

“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① 在西方，西域各国在王莽时与中原断绝了联系，但希望加入东汉的朝贡体系。但匈奴则因王莽之乱，重新在西域建立势力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在东汉前 20 年里，匈奴与东汉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汉高祖与冒顿的关系非常相似。^② 但显然，匈奴对东汉的实力优势差距远没有其对初期的西汉所拥有的优势那么大。

在此情势下，对内：光武帝非遇傲急，不再言军旅事。同时，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采取释放奴婢、招抚流民、奖励开垦等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对外：光武帝守文德而抑武事。起初，他试图用卑辞厚礼安抚匈奴，在匈奴不买账后，仍待之如初，同时辅以军事的防御。在匈奴遭遇旱蝗、饥疫及因王位继承爆发内乱时，武将臧宫等纷纷主张出征，但被光武帝拒绝，从此诸将不敢再言兵事。这一时期，光武帝还对 18 个西域国家提出的军事保护不予理睬。于是，这些邦国纷纷倒向匈奴。此外，光武帝还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疆域及乐浪、玄菟郡的大部或全部土地。^③

总之，光武帝时，在国家实力不居优势的情势下，依靠内部的稳定与发展来积蓄国家实力。对外，不试图通过胁迫方式做出改变，而力求绥靖，以低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甚至大幅度让步或收缩疆域。即使在对手战略形势恶化时，也不试图改变现状。它的内向色彩明显，符合消极性战略特征。

2. 积极性战略时期

明帝、章帝时，东汉国力继续上升，社会元气的恢复已有相当成效。史载，当时“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草树殷阜，牛羊弥望”。^④ 至和帝时，国力虽现疲态，但尚可维持。外部，光武帝时期匈奴已一分为二，南匈奴归附东汉，而北匈奴控制西域。历经天灾人祸，匈奴实力已大为削弱。战略形势已非常有利于东汉王朝。

①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②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第 256—257 页。

③ 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63 页。

④ 《晋书·志第十六》。

在此情势下,对内:明帝、章帝仍旧轻徭薄赋,劝勉农桑。和帝主政后,也多次减免赋税,保持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由于光武帝对西域采取收缩政策,匈奴得以在当地重建霸权,并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侵扰东汉边郡,以致河西四郡危如累卵,城门昼闭。明帝末年,东汉决心夺回西域。公元73年、89年及91年的三次决定性远征,以及班超天才般的外交活动,最终导致了北匈奴在西域和外蒙古的崩溃,^① 东汉设西域都护,重新控制了西域。

因此,从明帝至和帝,东汉一方面立足于内部的稳定与发展,积蓄国力,另一方面诉诸强制性手段,对地区秩序做出了较大修正。但其目标不是无限的,虽然带有较大的外向性,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匈奴的袭扰使得东汉别无选择,其落脚点具有较大的内向色彩。所以,东汉的战略行为是积极性的。然而,自安帝时,东汉国力开始衰落,故而,此后之大战略行为不再适合列入分析范围。

(四) 西晋的大战略行为

280年,孙吴被灭,三国时代宣告结束,中国归于西晋统一之下。当时的情势是:内部,灭吴速战速决,对社会的冲击不大,但在汉末以来战争的摧残下,民众生活艰苦,社会经济凋敝。全国人口不过767万左右,^② 仅相当于汉朝盛世时的1/10强。外部,匈奴帝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鲜卑人已无力恢复对中原王朝的攻击,中原王朝似乎不再受到来自草原的威胁。^③ 西域各国在东汉末曾一度与中国隔绝。曹魏时期,这些邦国恢复了朝贡。西晋立国后,它们继续保持着效忠。总之,这一时期西晋可以说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对外的战略态势极为优越。

在此情势下,对内,晋武帝虽然荒淫怠惰,生活奢侈,但实施了不少

①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第260—261页。

② 钱穆:《国史大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3页。

③ 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7页。